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蓝色东欧  
第5辑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高兴 / 主编

## 两座城市

[美]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 著

李以亮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Adam Zagajewski

TWO CITIE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TWO CITIES

## 两座城市

*Adam Zagajewski*

[波兰]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 著

李以亮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两座城市 / (波)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著 ; 李以亮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8. 9  
(蓝色东欧. 第5辑)  
ISBN 978-7-5360-8723-1

I. ①两… II. ①亚… ②李… III. ①散文集—波兰—现代 IV. ①I5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9154号

合同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5-100 号

TWO CITIES: On Exile, History and the Imagination by Adam Zagajewski

Copyright © 1991 by Adam Zagajewski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LC, New York.

出版人: 詹秀敏

丛书策划: 朱燕玲 孙虹

出版统筹: 李倩倩 夏显夫 欧阳佳子

责任编辑: 杜小烨 蔡宇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供图: 子夏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ANGULAR VISION

---

书 名	两座城市 LIANGZUO CHENGSH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5.5 2插页
字 数	152,000字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

本书中文专有出版权归花城出版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 两座城市

##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

---

(总序)

高兴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茨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

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妥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sup>①</sup>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

① 见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第44页，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做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只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轻松的姿态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



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僻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伯特、希姆博尔斯卡，罗马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以及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如此。卡达莱如此。马内阿如此。赫尔塔·米勒亦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杂

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伯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克沃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原因、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问。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

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主编简介：**高兴，诗人、翻译家，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上、下册）、《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水怎样开始演奏》、《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2卷）等大型图书。主要译著有《梵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我的初恋》《索雷斯库诗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等。

## 流亡·历史·想象力

---

(中译本前言)

李以亮

《两座城市》是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一部散文、随笔合集。此书一九九一年首次在波兰国内出版，一九九五年由丽莲·瓦莉女士译为英语在美国出版，并加上了“论流亡、历史和想象力”这样一个副题，分别概括了全书三辑文章大致的主题。因此也可以说，三辑大体可以提炼出这样三个关键词，只是每个词的意义都略显宽泛。我想提醒读者的是：此书的文章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论文，其文体形式灵活而多样，但是各篇的主题都是严肃的。部分文章偏向于回忆性的散文，部分文章则偏向于评析性的随笔。

此书成于作者的盛年，又值历史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想必各种问题纷至沓来，且作者充分调动了他所拥有的一切写作资源，包括个人和家族的记忆、各

种历史事件的解密、作家和知识分子方兴未艾的对摆脱历史钳制的努力、作为一名职业诗人对于诗歌美学内部诸多问题的思考，这些势必造成了本书内容上的宽阔，甚或驳杂，必然也会给阅读带来一定的难度和挑战。不过，我相信这也许恰是某些读者特别期待的。

整体而言，这本书给我的感受，既是一部简略的个人史（主要是精神史），也是一部带有个人问题的哲思录、诗学启示录。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即长篇散文《两座城市》，它有明显的自传和回忆性质，如同一篇“成长小说”。因为文体的缘故，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纪实性。两座城市是指利沃夫和格里威策，前者是作者的出生地，后者是他童年和少年时生活的城市。利沃夫在文中属虚写，是一个“失去的城市”，只出现在上一代人的讲述和作者的想象里；格里威策则是实写，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波兰社会的一般状况，特别是普通人生活的真实状况——在这座“丑陋的工业城市”，“仇恨和绝望”无处不在。

扎加耶夫斯基将自己定义为“无家可归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出生不到四个月，因为国家版图的重新划分，就被家人带到了原属异国的另一个城市；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更为复杂：“出于偶然、命运的不常、本身的错误或气质上的缺点，从童年或从锻造他的年少岁月起，他就不能或不想与他成长、成熟的环境建立起紧密和深厚的联系。”无家可归，成为命运的一种安排；诗人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对这种命运的承担与克服。“无家可归，但也并不总是不快乐。无论怎样，这个更糟糕的城市也给我提供了各种卑微的财富，首先是头顶的一个屋顶。”当然，我们不难想象，还应包括精神上的财富。事实上，我们从《两座城市》这篇回忆录中读到的，无不可以理解为诗人在精神上获得的财富，无论是上一代人“被割裂为两截”的生活，还是他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给予他影响的人物。正如作者所说：“我生活在一种成长小说里。”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思想的一个起点、想象力的一个源

头，以及他逐步提高的自我认识：“我怀疑，在许多交谈者眼里，我也许是一个令人不快的、自负的自命不凡者……我是荒谬的。”“我是谁？一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年轻的唯美主义者？然而，我不曾鄙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如何生活，才不伤害他人，才能帮助他们。”在扎加耶夫斯基的思想里，有一种倾向，便是对于生活本身的热情，其实它也深植于他的早年：

我体验到某种全新的东西：一个人可以与他人同在，在团体中间，在一群人中间，却仍然只是自己。一个人能敏锐、动心地感受到他人的存在，同时不失去自我，或作为个体和普通人的特性。

需要说明的是，《两座城市》并不只有抽象的议论，相反，它更多是通过细节的刻画，达到对于自我和他人的理解。有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楼下的一个邻居，憎恨当局，以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住所。有时他穿一件蓝色睡衣出现在院子里。他也来自利沃夫。他属于移民社区激进的一翼，并且拒绝接触新的世界里所有的一切。他穿睡衣走进院子，这样，就没有人会认为他离开过房子。不过是一个囚徒在监狱做一些身体的锻炼。那时我不理解他，他让我发笑；我现在想到他，想到一个人自己判自己多年的监禁，生活在那些没有被打开过的旅行箱、后德国的墙壁、半明半暗的环境中，是怎样一种苦难。他是一个老人，满怀仇恨和绝望。也许他在梦里回到了逝去的日子，那个不得不离开的地方。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总是穿着睡衣。他生活在梦里，只是在梦里。他的睡衣，犹如一件潜水服；他潜入往昔，仿佛一个蛙人。

我相信，这样的叙述高过许多的长篇大论，其穿透力，完全是可以超越国界和语言的。可贵的是，在《两座城市》里，这样的文字随处可见。

《两座城市》之后，作者还有一部同样具有自传性的回忆录《另一种美》，可以看作是其姐妹篇，后者既是前者的补充、延续，更是扩展和深入。

苏珊·桑塔格在其长文《智慧工程》里说，扎加耶夫斯基的书“部分是关于挣脱历史钳制的沉思”，即“如何将自我从历史的狰狞鬼脸和反复无常中解放出来”。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大体来说，扎加耶夫斯基不能算作“清算文学”的代表，他“并没有再去提供一份谴责，直指历史上的罪行和压迫”。

从本书的第二部分来看，两篇文章，矛头虽然也会指向“罪行和压迫”，但是文字的意义又不止于此，它们差不多都采取了巧妙的反讽方式，都有超出社会学研究的价值。作者给它们选择了一个总题：“公开的档案”。所谓“档案”，公开就具有“解密”的性质，同属于作者的“个人化历史”的写作。限于篇幅，具体内容不在此详述了。

上帝在哪里？——在受苦里，还是快乐里，在一束光里，还是在恐怖里？在富裕而自由的城市里，还是在集中营里？当然，我知道，很幸运我知道，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后一部分并不困难。然而，如果上帝偏爱黑暗和恐怖充斥的地方，那意味着什么？啊，在美里面，我也感到神圣的存在，但是，对我来说那似乎不是同一个上帝。是的，我知道，一个人必须敞开自己，必须谦卑地接受到来的一切，而不是坚持要理解那些不可理解的事物。我不应谈论这个，我是谁？冒险闯入一个属于教士的领域？我只是一个门外汉，我应该保持在自己的能力、经验和反思的范围内。

译者不能确定第二部分《春天的雷雨》有多少自述的成分（它讲述的部分往事的确并不是发生在作者身上的），但是，它确实透露了诗人在移居巴黎后的一些信息。作者在出国后确实也发生过转变，“朝向美学领域的飞升”。诗人的老朋友朱利安·科恩豪塞尔曾批评他改变了自己“集体的主题”，成了一个单纯的“抒情诗人”。对于自己被指控为一个“浅薄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有过这样的自我辩护：“在波兰，很多批评家指责我，说我漂浮到了一个审美愉悦的轻浮海面。当然，这样的看法并非是唯一的；波兰也有批评家能够公正地看我，他们认为我依然在对历史做出反应，不过不再是以我年轻时习惯的那种方式。”

本书的第三部分题为《新拉鲁斯百科小词典》，作者以影响颇大的一种法语词典之名，可能意在借喻本辑内容的广泛性和灵活性。这一部分，主要是作者对于波兰和欧洲几位诗人和作家的精短评论，以及作者关于一些哲学和诗学问题的思考，大都不成体系，有时只有思考的结论，并无更多的论证。

就在完成《两座城市》一书的翻译后不久，译者在波兰文化网站上看到一条消息：扎加耶夫斯基在德国被授予以让·埃默里的名字命名的“欧洲随笔写作杰出成就奖”。让·埃默里是一位犹太作家，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一九六三年后以散文和随笔写作反思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广为世界所知。扎加耶夫斯基被视为一个“擅长多语种的波兰人和一个世界主义者”，由奥地利作家罗伯特·梅纳瑟领导的评审团做出了表彰的决定。评审团的授奖词里写道：

扎加耶夫斯基结合了明亮的政治意识和共情的艺术关怀……博学，而不自视其高；全面，而不流于琐碎；反讽，而不愤世嫉俗。他带领读者穿行于历史和当代的欧洲文化，使他们因此而改变、丰富，并更为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愚而不明的处境。



几年前，扎加耶夫斯基也获得过由中国诗人黄礼孩主持的“第九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以及在北京颁发的第四届“中坤国际诗歌奖”。他的诗歌选集《无止境》和随笔集《捍卫热情》也由花城出版社收入“蓝色东欧”第三辑出版了。总之，对于这位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随笔家，中文读者开始逐渐熟悉起来。译者希望《两座城市》及《另一种美》的出版能对我们理解诗人的思想与写作艺术有所助益。译文中或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也请尊敬的读者、师友们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二〇一七年五月 武汉